

方面取得实质突破,全方位拉近、拉住欧洲,将其塑造成中国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中的重要一极。

(五)继续突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中的“金砖”板块,妥善处理日本因素。从运筹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度出发,以“金砖”、上海合作组织等为抓手,坐实新兴发展中大国合作,拓展、拓宽合作机制,花更大力气助推金砖机制建设,力争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诸多领域有更多的实质性合作,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在关键问题和务实合作上共同发声的战略依托。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近邻,又有历史的纠结和现实的冲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无法回避日本因素。安倍政权上台后,日本的右翼倾向继续上升,中日关系面临历史性考验。我们要继续全力争取日本,同时做好斗争准备,完善斗争策略,刚柔相济,为亚太地区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结语

今天的中国已然立于世界中心,无论是从大国责任立场出发,还是从创造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更舒适的发展空间看,我们都须直面全球治理改革的挑战。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要拿出大智大勇,积极、主动、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要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倡导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紧紧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于中国有利的变化与趋势,矢志前行、奋发有为,克服扫清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于中国不利的障碍,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楷模,更好把握并延长我们的发展战略机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特稿

东西南北,中国居“中”——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¹

王缉思

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拙文中,我将中国的国际定位概括为四点:(一)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许多方面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二)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三)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四)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²这篇拙文没有探讨的问题,是作为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扮演什么样的地缘战略角色。本文提出,中国可以在世界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之间,看到自己所处的“中间”地位,进而对国家的总体地缘战略进行重新思考。

东西方之间的中国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个球体,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群,都可以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从地理、生态、人口分布、人类文明史等诸多方面考察,真正成为世界中心的国家屈指可数。

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具有正统国家的含义。顾名思义,中国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中国”体现了先民在面对广袤的天下时,对国家地缘时空的自我定位。自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¹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赵明昊、徐彤武等许多学者专家指教、修改、补充、编辑,在此深表谢忱。

² 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逐渐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¹ 西方世界把“中国”诠释为“中央之国”（Central Kingdom, Middle Kingdom, 或 Central State, Middle State），是有其理由的。² 不过，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成为正式国名，“中华民族”的称呼才在这片土地上生根。³

“亚洲”、“东亚”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地区认同，是近代才出现的。⁴ 自遭受英法德俄美等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败于“东洋”日本之后，视自己为“中央之国”的观念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欧洲大国自视为世界中心，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⁵ 历史上，西方国家曾将中国与印度、埃及，甚至还有俄罗斯并称为“东方国家”、“东方文明”，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内容。中国的“东方”归属虽然最先是西方国家传教士和学者对“他者”的身份构建，但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激荡碰撞的大背景下，却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欧洲、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大部都在中国的西面，俄罗斯的经济政治重心地处中国的“远西”。朝鲜半岛、日本是中国的“近东”，美国对中国来说则是跨越太平洋的“远东”。就这一地理方位而言，中国确实是

1 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理解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可以有三个向度，即历史、文化和政治。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体制上说，很多人笔下口中的‘中国’，常常指的是一个王朝或一个政府，而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王朝和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更不是历史论述中的中国。”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页。另参见冯天喻：《“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3—4页。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2 关于中国人的民族国家与天下观念，见王康武：《民族国家与天下观念》，《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42期；Wang Gungwu,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Yongnian Zheng, "The Rediscovery of the Tianxia World Order," in Gilbert Rozman, ed.,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Widening Gaps in East Asia and Chinese Demo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3, pp. 127-152;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 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清朝政权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在清俄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中国”是与“俄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1842年签订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至清晚期，由日本译制的“民族”一词传入中国，“民族”与“中华”组合而成的复合词“中华民族”于20世纪初期出现，曾与“中国民族”同位并用。参见冯天喻：《“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4—6页。

4 关于“亚洲”、“东亚”、“东方”等近代以来形成的观念及其辨析，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

5 俄罗斯科学院至今将研究东亚各国的研究所定名为“远东研究所”。

“中央之国”。如果不是近代西欧压倒性的强大实力和先进文明，中国未必会自视为东方国家。同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东亚国家，它的一大片内陆领土可以说是中亚或南亚的一部分。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的自然生态和民族宗教文化特色，与其说同东亚其他国家接近，不如说同中亚、南亚的近邻更有亲缘关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大力灌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¹ 此后中国的“东方”认同，又强化于美苏冷战时期。当时的两大政治军事同盟被称为“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而中国又处于“东方阵营”中的东方。“东方”的地缘政治概念，遂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挂起钩来，深化了中国人的“东方”定位意识，而“西方”则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代名词。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道：“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势力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绝对的优势。”² 这句话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

20世纪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美国特使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毛泽东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来自苏联的扩张势头。³ “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形成，说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告别了冷战初期“东方—西方”的地缘战略观念，而且中国有意成为抗衡来自“北极熊”的威胁的中坚力量。正如中共党史专家冷溶所指出的：“‘一条线’，是从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建交开始着手，到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中日签订了含有反霸条款的友好条约，正式建立起来的。决定建立‘一条线’，正是为了缓解苏

1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在日军攻占中国武汉、广州等地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主张，其要义之一是削弱英美等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影响。蒋介石于当年12月发表讲话称“这是个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总名称”。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大东亚共荣圈”一词，是1940年8月时任近卫内阁外相的松冈洋右在“皇道外交宣言”中正式公开使用的。参见赵建民：《“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

2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3 富力：《毛泽东“一条线”构想的形成及战略意图》，作者博客，<http://gongli.blshe.com/post/16286/773679>，2013年4月12日。

联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一条线’建立的同时，我国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¹

当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邓小平以“东西南北问题”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代替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抵御北方威胁的“一条线”战略。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²从邓小平讲这番话的时代背景看，“东西”指的是苏联为首的“东方”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争霸，带来了世界和平的威胁，而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

“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当今世界的“东方”成为一个模糊概念，已经不再是某种军事政治集团和政治制度的代称。同时，“西方”仍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被广泛使用，布热津斯基等西方战略家还提出了将俄罗斯和土耳其包括在内的“大西方”概念。³

此外，中国的“东方观”一直受到美国地缘战略和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在太平洋的西岸和东岸，但两国的传统思维——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国是东方国家——是同地理概念相悖的。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亚进行了四场战争：1898年为夺取菲律宾同西班牙进行的战争、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中第一场战争的结果，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独立后的菲律宾至今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以至于影响到美国对中南沙群岛之争的态度。后三场战争则直接同中国相关。19世纪中叶美国用军事手段敲开日本的海上门户，19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此后便一直在战略上把东亚看成一个整体。美国将西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占为自己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将关岛建为军事基地，成为美国进入东亚的跳板。当代美国的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涉外机构，都把对华事务

1 冷溶：《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http://theory.people.com.cn/G8/41038/4161932.html>，2013年4月12日。

2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3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大战略应着眼于当今和未来一个时期出现的“大西方”和“复杂的东方”，美国应支持将俄罗斯和土耳其纳入扩大的欧盟之中，而在“复杂的东方”，美国应发挥平衡者的作用。这实际上可被视为美国战略界推动该国领导层更新世界观和对外政策构想的一种努力。参见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2. 英国学者考克斯 (Michael Cox) 认为，“西方”的政治范围如今已经扩大，不仅包括跨大西洋联盟，还可以包括印度、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见迈克尔·考克斯：《西方衰亡之说为时过早》，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简报》，第48期，2010年8月30日，<http://www.cis.pku.edu.cn/zh/DocumentView.aspx?id=607>。

放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框架中处理（欧洲一些大国和俄罗斯也有这种传统和倾向）。最典型的是，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分别被视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里分管对华关系的主要负责人。在美国的官方语言和一般人理解中，“亚洲”和“东亚”是混用的。一度甚嚣尘上的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论调，其实主要是“重返东亚”，同南亚稍有关联，而同中亚、西亚基本无关。¹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智库和大学课程设置也大都把“中国研究”置于“东亚研究”之内。无形之中，美国对华政策被视为仅仅是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亚”真正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形成的。冷战时期，美国的双边安全同盟将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相连接，东盟成立后的地区合作、日本经济腾飞、东亚“四小龙”齐头并进，都将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靠山。苏联曾一度通过越南挤进东南亚地区，但不久就丧失了影响。英法等欧洲大国也纷纷丢掉了在东南亚的原有地盘。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安全的曾受到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北部边境四个方向的严重威胁，分别同美国和苏联发生过军事对抗。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第一个主要对象是东亚。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东亚，同时给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注入了巨大动力和活力。迄今为止，中国同包括美国、加拿大、东盟、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仍然远远超过同欧、俄、印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也来自地理位置上的东方而非西方。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航空和陆地交通迅速发展、东亚对中东非洲的能源资源需求扩大、美国“反恐战争”以来的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等诸多因素，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有的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亚洲” (Indo-Pacific Asia, 又称“印太亚洲”) 的地理框架，据此思考所谓全球权力向亚太转移的问题。²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缘政治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无形中受到侵蚀。

1 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方艾文 (Evan A. Feigenbaum) 认为，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在思维能力和战略和官僚机构设置方面存在问题，美国需要打破人为设置的界限，扩大在亚洲的活动范围，适应和利用亚洲区内的重新融合态势。奥巴马的首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詹姆斯·琼斯上将在2009年上任伊始曾表示，美国要重新思考“战略地理” (strategic geography)，国防部、国务院等机构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图”需要被重新绘制，使美国外交和军事更好地统一起来。参见 Evan A. Feigenbaum, “Why America No Longer Gets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11.

2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Centre of Gravity series, The 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re (SDSC),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November 2012; Nick Bisley and Andrew Phillips, “The Indo-Pacific: What Does It Actually Mean?” *East Asia Forum*, October 6 2012,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10/06/the-indo-pacific-what-does-it-actually-mean/>.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领导者”,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integration)的势头显然遇到了阻力,“东亚共同体”设想风光不再,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印度5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应运而生,此后日益活跃;中国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同西部边境外各国关系发展迅速;欧洲在东亚不甘落后,亚欧会议(ASEM)从成立之初的26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51个;美国热衷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冲淡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国家则越来越把目光投向地区之外。第一届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013年3月撰文指出:“过去10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已悄然成为帮助中东和南亚加强与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大多数亚洲国家一度只关心家门口发生的事情。别处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许多亚洲国家破天荒地开始将眼光投向‘本地区之外’,并开始以积极得多的姿态参与中东和南亚的外交事务、发展难题和安全事务。”¹

近代以来,从“远东国家”、“东方阵营”的一员,到“东亚大国”,再到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亚洲大国”,未来或将成为“印太亚洲”这一偏重海洋色彩的亚太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地缘战略定位越来越向亚洲的中心靠拢,陆权与海权并重。亚欧大陆是“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中国是“一陆一洋”的大国,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则是“两洋一陆”大国。中美美三大政治经济板块具有各自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生存空间”巨大,分别发展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区域,又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融合。²印、俄、日三国都在某种程度上长期面临着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难题。³一个兼具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性质,且以地缘经济为更突出特征的宏观体系,也许可以据此而建构。⁴

1 Kurt Campbell, "America Must be Responsible in Its Pivot to Asia," *Financial Times* blogs, <http://blogs.ft.com/the-a-list/2013/03/19/america-must-be-responsible-in-its-pivot-to-asia/?#axzz2P8Bc7WlQ>, March 19, 2013, 中译文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FT中文网);《科特·坎贝尔:美国应负责任地“重返亚洲”》,2013年3月25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588>, 2013年4月15日。

2 关于中美欧建立“三方集团”(G3)而非中美“两国集团”(G2),参见Mark Leonard and Parag Mehta, "Why China Wants a G3 Worl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11。

3 比如,俄罗斯近年出于平衡外交布局、突出欧亚大国地缘优势、实现经济现代化等多种长远性考虑,加大了“转向亚洲”的力度,但其仍倾向于保持“欧洲国家”的身份认同,体现了一种“如果想向西方靠拢,就要向东方迈进”的战略逻辑,参见李志业:《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载《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1期。

4 至于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地缘地位,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看法是:“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南北方之间的中国

建国初期,中国遭受欧美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北方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经贸伙伴变为北美、西欧和东亚国家,同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发展中国家大多地处南半球或北半球的南部,而发达国家大多在北半球,于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中国绝大部分领土地处北回归线以北,从地理上应被视为“北方国家”,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一直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尽管中国从来没有正式自称为“南方国家”,也不是七十七国集团成员,但相似的历史地位和政治主张经常使它们走到一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同该集团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新合作模式,中国全面参加了与该集团有关的会议和活动。

但是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成为现代化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¹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²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规定的战略目标是:“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³可以预见,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的三四十年时间里,虽然全球发展趋势有难以确定的因素,但世界上的南北鸿沟仍然存在。如果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在此期间得以成功实现,那么届时将完全脱离发展中国家或南方国家行列,同其他发达国家或北方国家并驾齐驱。⁴换言之,无论从主观愿望看,还是从客观发展趋势看,中国都不会“将发展中国家进行到底”。

事实上,今日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

首先,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

1 值得指出的是,“现代化”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认定的前进方向和最终归宿。对于“现代化”的内涵,不同国家和学者专家也有不同认识。

2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4 据世界银行预测,如果中国经济一直以不低于6%—6.5%的速度增长,中国在2030年将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见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AIB/2013/03/27/000350881_20130327163105/Rendered/PDF/762990PUB0china0Box374372B00PUBLIC0.pdf。

中国。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国内生产总值远远高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之总和。发达经济体通常具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者格兰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2013年3月撰文指出，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两倍于其他金砖国家，未来10年中这一差距可能继续拉大，所以“中国不属于金砖国家”，倒是其他四国可以算作同一级别的“肋骨国家”（RIBS）。据阿利森计算，中国现在的商品出口额是其他四个金砖国家总和的两倍，外汇储备是它们总和的三倍，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它们总和的两倍，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30%。¹

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载人航天飞船、高铁等国家工程“大手笔”，让世界上很多人感觉中国“不像”发展中国家，于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其中有些是发达国家才应当主要承担的义务。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据说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欧洲国家）和环境污染，使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承受了大得多的国内外压力。²应当看到，中国在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和稳定、保护知识产权、网络与太空安全、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等诸多方面承担更大的国际义务，不能仅仅被视为应对国际压力、改善国际形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中国以量力而行、权责对等的方式承担国际义务是促进自身长远利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其次，30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在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中形成了一个新月形——从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穿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直至中东和高加索地区，再到南亚北部。在南方国家庞大的“人口膨胀带”里，青年人比例高，失业率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冲突。南方国家人口激增，北方国家原有人口缩减，老龄化问题突出。由此带来的全球人口大规模地从南向北移动，给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加拿大补充了劳动力，但也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社会负担，引发了族群宗教矛盾和社会骚乱。

在人口发展的南北反差和矛盾中，中国仿佛置身度外。尽管中国向海外的劳务输出数量越来越大，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非法移民，但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

1 RIBS是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四个国家英文名字的头一个字母，英文拼出来的单词是“肋骨”。Graham Allison, "China Doesn't Belong in the BRICS," *The Atlantic*, March 26, 2013, <http://www.theatlantic.com/china/archive/2013/03/china-doesnt-belong-in-the-brics/274363>.

2 一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在危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否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出现了中国同77国集团中的许多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参见孙学峰、李银株：《中国与77国集团气候变化合作机制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90—104页；引文见第95页。

比例与在全球的国际劳工和移民中所占的份额都很小。同时，中国海外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是去南方国家。随着国内部分地区劳动力短缺的出现，预计中国人口向外移动不会持续扩大，而某些南方国家向中国输送劳工和移民的现象已经出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如日本和俄罗斯那样严重，但已同某些欧洲国家类似，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要突出一些。在完善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中国同发达国家和俄罗斯的共同关切会越来越多。¹

最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南方国家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与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摩擦也在增多。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倚仗丰富的自然资源出口初级产品，而中国则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大力发展制造业。据美国一家大型经济信息调研机构IHS的数据，201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已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恢复了曾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期的地位。²基于国际分工以及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制造业，在中国形成了产业中心。如何借鉴这些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准并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是同发达经济体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中国制造业正遭遇着国内经济速度放缓、用工成本上升、出口疲软、产业转型升级等挑战，而在国际上则处于“前阻后追”的境地，前有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和先进技术，力推制造业复兴；后有东南亚、南亚、非洲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掀起工业化浪潮的追赶。³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南北关系理论思维和分析框架是有缺陷的。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处理南北矛盾、缩小南北差距的根本途径，是要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中国对南北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发生了微妙但却显著的变化。1992年的中共

1 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对中国人口的评估和预测做出了重大调整，预测中国人口在2026年达到峰值13.96亿后迅速下降，到2050年时下降到12.95亿。预测表明中国快速迈向老龄社会大势已定，无法逆转。此外，从人口老龄化到社会老龄化美国用71年，中国仅用21年。美国养老基金2010年达到18.89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63%，是其GDP的120%；中国养老基金加总额为1.5万亿元人民币，是美国养老基金的1.27%。美国的养老基金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实惠；而中国养老基金由于空账运行、缺乏市场运作，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参见杨燕绥等：《不同的老龄化，不同的发展模式》，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蔡昉：《未富先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1期。

2 彼得·马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FT中文网），2011年03月1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460#utm_campaign=1D130202&utm_source=marketing&utm_medium=campaign，2013年4月12日。

3 叶荷认为：“跟过去相比，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有了更新，从加工制造业转向装备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双方的竞争性也同时加剧，发达国家以技术封锁、规制约束等方式阻拦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加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形成挤出压力。”叶荷：《中国面临不一样的战略机遇期》，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

十四大报告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分别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则号召“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¹但是，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却将这一提法调整为“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后，中国官方正式文件不再强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这份白皮书谈到了“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中国不断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南北合作框架下，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²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没有提到“南北差距扩大”或“南北合作框架”问题，只说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和全球性问题治理，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³可以理解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非完全不公平、不合理，但是需要改革。这份系统阐述中国对世界看法的白皮书还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为更多国家提供了通过经济发展和互利合作实现振兴的历史条件，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在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⁴

上述官方思想的调整意味深长。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3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未来十年的中国》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实际上正在介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仅是南南关系，而且是南北关系、北北关系，在这三个维度上中国都面对着对话的格局。中国需要对非西方地区有更多的理解和了解。在对非西方地区的关系上，如果中国重复过去欧洲人的道路，将会引发新的冲突，甚至引发国际地缘秩序的变化。因此，未来中国在传统型、多样性、区域关系、内部关系等方面都面临巨大挑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未来定位的时候充分考虑。”⁵

诚然，中国戴着“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还要走很长甚至可能很曲折的路，中国同其他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和共识在增加。但同

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22日发布。全文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5/200905/t307900.htm>，2013年4月15日。

3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发布。全文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201109/t1000032.htm>，2013年4月15日。加重线为引者所加。

4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球治理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是中国最高层级的官方文件首次使用“全球治理机制”这一概念，表明“全球治理”在中国领导层看来正从“西方治理”转型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共同治理”。参见黄仁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与金砖国家崛起的新机遇》，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1期。

5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未来十年的中国》，<http://www.nsd.edu.cn/cn/print.asp?articleid=16746>，2013年4月15日。

样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识也在增加。中国不是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的“造反派”，而是推进渐进改革的“建设者”。如果说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是某种“异类”，它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中间国家”，是沟通传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桥梁国家”，它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很难归入哪一类，但却需要融入整个世界。

地缘战略大棋局思考

综上所述，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一个角度，又可以说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如此看来，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¹根据这样一种全球定位来设想中国的地缘战略，可以形成一些基本思路。

本文中的“地缘战略”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²虽然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是相对稳定的，但地缘战略却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调整。应当看到，当代全球政治的新趋势正在不断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理念，有学者甚至提出应加入“地缘技术”、“地缘宗教”等新的分析维度。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曾有过不同的地缘政治定位，同某些国家建立过军事同盟关系，应对过来自不同地理方位的安全威胁。今天多数国内论者认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东方，来自海上，即美国和日本。海权和海洋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同时，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堪忧，出现某种爆炸性的局面并直接危害中国安全，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在地缘经济方面，很长时间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正在形成三个相互独立而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第一个是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组

1 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沈大伟在200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中国是否正在“回归中央王国”，但基本上只涉及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及同周边国家关系问题。见 David Shambaugh, "Return to Central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23-47.

2 地缘战略可以作为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地理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国土资源、自然环境等）如何影响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行为，以及国家应当如何依据自己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条件制订国家长远目标和战略。关于地缘战略研究的界定、概况和相关文献，可参阅维基百科“地缘战略”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strategy>。

3 有学者认为，“地缘技术”已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生物技术以及这些技术的交叉互动将在未来几十年对地缘政治产生显著影响，“地缘技术”的发展主要依赖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见 Marc Goodman and Parag Khanna, "The Power of Moore's Law in a World of Geotechnolog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23, Jan/Feb 2013. 关于地缘宗教问题，见徐以攀、邹磊：《地缘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成的东亚或环太平洋经济区；第二个是美国牵头的北美经济区，或将向南扩展为西半球经济区；第三个是以欧盟主要国家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或将逐渐覆盖东欧、俄罗斯，对地中海和北非地区施加影响。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建设东亚经济圈，甚至形成以人民币、日元为核心的东亚货币体系，以便在同美欧的政治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¹今天，中国在全球生产链条、贸易关系和总体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双边贸易额远超其他作为单个国家统计的贸易伙伴。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则中国同东盟的贸易额超过中日贸易。

于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和隐患，恰恰同中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来自同一个方向、同一些国家和地区。这种矛盾现象福兮祸兮，耐人寻味。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和战略互疑加深，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明显带有牵制防范中国的意图；中日关系紧张，对抗因素增加，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大受影响，双边关系未来若干年内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改善；朝鲜半岛局势扑朔迷离，不能排除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在东海、南海同相关国家的主权争议此起彼伏。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相对稳定，但“台独”远未销声匿迹，美国对台（湾地区）军售的阴影也随时会重新笼罩到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上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在同两位美国资深战略学者的访谈中，忧心忡忡地评论道：“中国终将面临一项重大决定”，即是否要取代美国，在亚洲充当霸主。²在中美对立、中日对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再谈“东亚一体化”或“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已经远离现实，或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同时，维持同美国以及东亚各国关系的大局稳定，才能保证中国同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继续扩大。这是中国“东方”地缘战略的核心。

中国在东部方向上进行战略经营的空间已变得相对有限，但如果往中国西部境外看，那里的地缘政治形势同东亚大不相同，中国可以利用的潜在机遇很多。如果说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更多的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经济困难、民族和教派矛盾、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国内和跨国问题。中、美、俄、印、日、英、法等大国在这些地区存在竞争关系，但合作潜力较大，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由于西部境外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巨大，投资机会很多，

1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的群体性快速发展，这种以北美、欧洲和东亚为核心的地缘经济理论正在得以修正。参见黄仁伟：《地缘理论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特1期；潘忠岐：《地缘学的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一种分析框架》，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

2 Graham Allison,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li Wyne,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2013, pp. 1-3.

中国向西部国家拓展利益，符合自己的长远战略需要。¹

更重要的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决定了亚欧大陆对中国具有越来越大的战略重要性。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指出：“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因此，布热津斯基强调，“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500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²美国这个“非亚欧大国”尚且有战略家如此重视这一大陆板块的地缘政治意义，称之为“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美国也确实力图在此获得主导地位，中国应当如何在亚欧大陆布局造势，就更值得深思了。

从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多方面发展趋势看，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大中东”地区，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一种看似有理的中国应对思路是：中国绝不能陷入“大中东”的泥潭，而应该将这里的乱局留给美欧去收拾；这个地区愈乱，美国愈无法抽身到亚太地区遏制中国。这种思路的引人质疑之处在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大中东”的动乱将迅速祸及其他地区乃至全球，地区外大国想不闻不问、独善其身，不仅做不到，而且会损害自身利益与安全。³2011年利比亚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直接经济损失，就是明证。另外，中国西部境外的安全形势恶化，也会影响国内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加大内陆、沿边对外开放的风险。所以，中国应当严密注视“大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以各种手段加大在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

1 参见王绍缙：《“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两平衡》，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家战略研究简报》，第73期，2012年10月7日。这篇博文并未将“西进”作为一种战略来看待，更多的是希望中国外交能以一种更加全面、平衡的战略思维为基础。“西进”并不意味着要偏废“东稳”。关于中国学界对“西进”问题的讨论，见《中国的西进问题：研判与思考》，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1期。

2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第41页。

3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逐渐增加，而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在逐渐减少。由于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开发，美国在未来数年内实现“能源独立”的前景更加确定；与此同时，包括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法属圭亚那等国在内的南北美洲又有巨量油气资源新发现。据此，有学者提出世界油气中心将由大中东地区“西移”至西半球的南、北美洲。这一新情况必将引起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也将对中国的能源环境和地缘战略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参见林利民：《世界油气中心“西移”及其地缘政治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9期。

而不是仅仅做一些原则性的外交表态。¹同理,对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非洲某些国家的内乱,中国也不能袖手旁观。

在亚欧大陆的棋局中博弈,还应当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及西亚北非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由于西部境外若干地区的动乱因素,有朝一日中国可能不得不动用军事或准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权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这是应当未雨绸缪的。

中国的人流物流经由陆地和空中进入西部比过去便捷得多,中国公司承包或中国援建的公路、铁路在中亚、中东、南亚遍地开花。从中国东部港口起,穿越亚欧大陆,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陆桥”,都在开发建设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权和海洋战略不重要。恰恰相反,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对中国同亚欧大陆日益密切的联系至为关键,但中国不应用传统的陆权思维去看待海洋或海权问题,即把眼光局限于中国的近海。中国加强海上安全的活动,包括在非洲之角附近同各国合作打击海盗,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

美国《华盛顿时报》早在2005年初即披露了美国国防部一份名为《亚洲能源的未来》的内部报告,声称中国正在采取一项“珍珠链战略”,从南海到中东的海上航道沿线建立战略关系,保护其能源利益并同时为广泛的安全目标服务。²中国外交部门随即予以否认与驳斥。其实,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这样一种主要出于保护自身地缘经济利益的印度洋战略谋划。³2013年2月,美国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卡普兰又撰文谈中国的“珍珠链战略”。他既未确认、亦未指责中国有这样一项计划,同时指出,“珍珠链”不一定意味着海军基地本身。“除了更加依赖中东能源以外,中国也越来越深深地卷入到中东和非洲大陆的贸易、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采。印度洋处在二者之间:它是21世纪欧亚世界的海上枢纽,日益将东亚与中东紧密相连。就此而言,瓜达尔、汉班托特、皎漂等地可以成为中东与东亚之间的物流中心和产品运输的仓储设施”。⁴卡普兰的观点值得重视和借鉴。中国舰船从南海驶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需要使用若干补给

1 参见朱成烈:《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刘中民:《中东变局与世界主要大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兼论中国的中东外交》,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

2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7, 2005,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5/jan/17/20050117-115550-1929r/?page=1>, 2013年4月12日。

3 有西方学者指出,关于中国“珍珠链战略”的评论,在一定程度夸大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意图和能力。参见 Michael J. Green and Andrew Shearer, “Defining US Indian Ocean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5, No.2, spring 2012.

4 Robert Kaplan,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Real Clear World*, February 15, 2013, http://www.realclearworld.com/articles/2013/02/15/chinas_string_of_pearls_100558-2.htm, 2013年4月12日。瓜达尔、汉班托特、皎漂分别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港口,中国近年来参与了这些港口的修建。该作者对印度洋战略地位和美国战略的更系统的阐述,见 Robert Ka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基地,是天经地义的事。环印度洋地区本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同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架起桥梁的重要桥墩。¹

中国还可以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让利益攸关方分担政治经济风险,实施一种“开放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利益扩展战略。同时,需要更加重视内陆和沿边的开放,不仅要国内审视国际,也要更加注重从国际反观国内,真正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兼顾与融合,为“西部大开发”等国内发展战略的实施树立更加稳固和更具效力的国际战略支柱。温家宝总理在2013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深化沿海开放与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结合起来,加快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格局;坚持把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结合起来,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汇合点。”²借鉴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战略,把“走出去”当作中国产业链的海外延伸,是扩大利益汇合点的应有之义。开发能源、矿产、农业、林业、渔业等资源,投资于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

中国应当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东亚)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在亚欧大陆以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而不以恢复“华夏秩序”、追求“东亚霸主”或“亚洲霸主”为目标。只有营造出一个安全、繁荣的周边环境,同新兴大国和南方国家加强合作,才有更好的基础去同发达国家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只有同美欧等发达国家发展竞争共处、互利共赢的关系,才能稳住自己的周边。中国不应因周边问题的困扰而在地区治理、全球治理领域缩手缩脚,而应更加主动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积累有利于解决周边问题的战略资源和国际政治资本。中国战略家郑必坚指出:“扩大和深化同相关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构想。即是说,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和平发展。”³引申来说,“全方位的战略构想”,从地缘空间来看,就是“东西南北”各方。

从本质上说,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是冷酷的,是基于现实利益而非基于道义

1 印度洋是世界海洋的“枢纽”地带,拥有1/9的世界海港、1/5的货物吞吐量,印度洋的“石油航线”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倚仗的“战略生命线”。中国应当加强对环印度洋地区的研究和战略谋划。

2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3月5日, http://www.gov.cn/2013/hv/content_2356704.htm, 2013年4月12日。

3 郑必坚:《在和平发展中构建利益共同体》,《人民日报》,2013年3月17日,第9版。

或意识形态的。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利用和把握国际力量的平衡。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在2002年提出,要以建立一个“有利于自由的力量平衡”来构筑国际体系。¹其要旨无非是拉近美国同所有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距离,使之比这些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从而令美国在其所在的所有三角关系中都处于“顶角”位置。

从客观情况看,中国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大国竞相“平衡”的对象,但中国在一个多维、复杂的世界中腾挪移转、纵横捭阖的空间,实际上较过去更大了。当今大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共存”特征越发明显。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努力建立一个“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力量平衡”。为此,应当拉近而非疏远中国同俄罗斯、印度、日本、美国等重要国家之间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东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非洲、北美、南美、大洋洲等地区的战略。同时,应将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环保等功能性问题同地缘政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也就是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形成“和平发展大战略”。中国的长远目标是成为“以天下为己任”(即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全球大国。同时,中国也应避免妄自尊大,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

不言而喻,更艰巨而首要的任务是国内发展。中国的国内发展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收入分配不够均衡、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等等。这些瓶颈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解决。而扩大开放可以为开启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新一轮改革进程提供“倒逼效应”。²

最后,冷酷的现实主义也需要激情和理想来填充。毛泽东在1935年长征结束时写的《念奴娇·昆仑》一词中畅想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³毛泽东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尚且有放眼世界的诗意思象力,近80年后的中国战略家和领导者,就更应具有胸怀全球全人类的气魄了。

1 Condoleezza Rice, "A 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Freedom," remarks to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New York City, October 1, 2002. <http://www.manhattan-institute.org/html/w2002.htm>.

2 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考察江苏、上海时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点,就是改革与开放相伴而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促改革,“现在看,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要以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观念和体制创新,形成开放新格局”。参见胡舒立:《新一轮“开放促改革”之要义》,财新网《新世纪》周刊(总第547期),2013年4月8日。

3 毛泽东在1958年12月21日为这首词的批注中写道:“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参见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专 题

挑战、机遇与对策

张浣生

内容提要:自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不断上升,并于2012年达到了一个高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进入摩擦高发期。然而,这不应动摇中国对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中国崛起得益于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进行改革开放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三者不发生根本改变,战略机遇期就会继续存在。为化挑战为机遇,作者提出了坚持行之有效的和平外交政策、准确界定核心利益、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为三大突破口、加强高层政策协调决策机制、进行战略规划与加强危机管理等九条政策建议。

关键词:战略机遇期 安全环境 安全挑战 安全对策 和平发展道路

2012年已经过去。在这一年里,中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继续升级,安全环境中的消极面持续增长,以致国内外都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吗?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二句是:“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第三句是: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¹

从一定意义上讲,如何做到“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有效维护战

张浣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